

日本战败前后的山田乙三

张辅麟

作为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经历了伪满洲国覆灭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最混乱也最动荡的岁月。

最初山田乙三最大的苦恼是大本营战略指挥的多变，使他有些无所适从。

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攻击矛头重点指向美英，战略指挥重点也转向南方，由此使关东军原来军事上的一系列部署全都被打乱了，大本营要求关东军改变“关特演”前后准备对苏发动突然袭击的作战设想，而采取“大体维持现状，加强防卫，严密警戒，尽量避免发生战争”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山田乙三出任了关东军总司令官。他上任不久，即在1944年9月18日，大本营又给他下达了如下的命令：①为完成“大东亚圣战”之任务，确保大日本帝国之国防圈，必须破坏敌人之战斗意志，对苏极力防止战争发生；②关东军总司令官负责满洲与关东州的防卫，要支援“大东亚圣战”，根据北方形势的变化，做必要的对苏作战准备，要依据《帝国陆军对苏作战要领》行事；③关东军总司令官根据需要可指挥驻朝鲜军司令官。这一命令虽然提到了“做必要的对苏作战准备”，并扩大了山田乙三的权限，他的军事指挥权可伸展到朝鲜，不过仍然要求关东军支援“大东亚圣战”，不断调兵遣将南进，而命令中所说的《帝国陆军对苏作战要领》却迟迟不见下达，这样一来，山田乙三的“作战准备”就无所遵

循，纯然变成一句空话了。

大本营之所以如此，还在于他们仍沉溺在“苏联不会马上进攻日本”的梦幻里，他们是把《苏日中立条约》做为北边的安全屏障，认为日本关东军可以放松一下对北方苏联的防务。不料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大本营才从梦幻中醒来，方意识到“满洲国”面临的事态严重。于是，5月30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关东军下达了新的对苏作战要点，要点明确对苏作战之目的为“击溃入侵满洲之敌，确保京图线（长春——图们）以南，连京线（大连——长春）以东之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这就是说，大本营要求山田乙三守住以长春为顶点，以图们、大连为底线的这一三角形地带。这一部署，体现了大本营改变了已往的战略方针，重新确立以日本本土为主要战场，以满洲和朝鲜为辅助战场的主从配合之军事行动方针，要求关东军死守中国东北南部、西部，特别是东边道一带。而关东军几年来却一直围绕在中苏东部边境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进行备战，也算惨淡经营了几年，在山田的前任梅津主持下，从琿春至土门子，东宁至绥芬河，半截河至庙岭，延及虎头一带，这四个国防前沿地段都修了国境阵地和野战阵地。现在根据新的作战部署，山田乙三要在兵力部署上，大大收缩东部、北部防线，而转向南部和西部。但改变作战的军事部署并不像在棋盘上挪棋子那样简单，山田乙三将要把散在东部和北部国境线附近的各兵团撤出去，随着部队的调动，大量军用物资也必需同时转移，还要重新构筑“满洲国”南部和北朝鲜的阵地，而大本营对时间又要求的很急迫，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对此，真让山田感到困难重重。

正当山田为大本营改变军事部署而大伤脑筋的时候，新上任不久的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衔天皇裕仁之命，于1945年

6月4日专程来到大连，在星个浦满铁总裁官邸，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传达了《对苏作战计划要领》，这可正是山田盼望已久的。梅津对山田解释说，《要领》的部署是把满洲和朝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样做是出于加强对帝国本土防卫的考虑，可以说，满洲是帝国的第一道防线，关东军坚守这道防线，不要拘泥于国境线的防护，出于战争需要那怕把全满洲四分之三的地方都放弃了也行，主要目标是固守以通化为中心的东边道地区……梅津的这番解释表明，大本营陆军部不仅以坚守本土作战为目的，还把坚守第一道防线的重任交给山田乙三领导下的关东军来承担，看来日本最高当局对山田这位总司令官还是寄予厚望的。

山田从大连领命回到“新京”后，立即与秦彦三郎总参谋长计谋，他们决心不负陆军部的重托，马上进行新的备战部署。十天以后，6月14日山田召集兵团长会议，命令所属各军，制订计划，做好准备；为加强东边道防线，山田下令特别改编和加强了工兵部队，专门组织了一个建设兵团，在通化一带搞防御性军事大工程，修建最后抵抗阵地的复廓工事，以及敷设通讯联络网、交通干线和安排作战资材的纵深配置工作。从6月末开始，动员了3万伪满“国军”以及“勤劳奉仕队”，还在各地强抓一批劳工用武力逼迫他们拼命赶修。但因为期限短，资材又不足，人员消极怠工，因此捱到7月末，东边道的军事大工程也没有什么进展，大部份还停留在纸面计划上。

山田乙三会同参谋总长秦彦三郎和幕僚们依据《对苏作战计划要领》的要求，于7月5日总算重新确定了关东军的对苏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尽量利用朝鲜东部山地、牡丹江西侧山地、大小兴安岭和四平至齐齐哈尔线外沿地区的地形和工事，努力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利用满洲和朝鲜的广阔地域和地形，

狙击敌人进攻，并在这一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关东军主力集中在“新京”至大连线以东和长春至图们线以南山地，打退敌人进攻，万不得已时，也要扼守通化、临江一带。

军事计划是制定了，不过由于作战方针一变再变，一切都要重新部署，而兵力、财力、物力乃至劳力又都严重不足，使山田乙三深感难担重任，于是产生了侥幸心理，把希望寄托在苏军不会很快发动进攻上。大本营分析，苏联只有在“满洲国”边境集结到拥有40个步兵师时，才能形成对关东军的威慑力量，要完成这一兵力部署，大约要在1945年8月末，至于要做到对关东军主动攻击非拥有50个师的兵力不可，这就要在9月以后。山田乙三在接受大本营有关方面的这一分析之后，出于侥幸心理，加上主观唯心的认定，排出了一张错误的时间表，正如关东军作战参谋草地卓吾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如果苏联马上来打，我们真难以应付，倘若再过一段时间，在编制、装备、训练上或可有所改进。但愿苏军在今冬以前不打进来！”这位大佐的坦白自供，充分地展示了以山田乙三为首的关东军首脑们的心态，他们幻想能把危险的8、9、10三个月度过去，冬天苏军不能打仗，捱到1946年春天，战争形势会对关东军有利一些。

基于这样一种推想，8月8日山田乙三应关东局总长三浦的邀请，去大连休息观赏歌舞伎的演出。午夜零点20分关东军总司令部值班参谋铃木中佐接到第五军情报参谋前田中佐来电称：“敌于零时攻击虎头正面监视哨，进攻满洲领土，有强大的后续部队。”接着第一方面军也来电报告：“东宁、绥芬河正面之敌开始进攻。”真可谓山田前脚走，后脚苏军就开战。秦总参谋长立即打电话向他报告，山田听了心中不由暗暗一惊，但表面却不露声色，只说了一句话：“给我准备一架飞机，我要立刻

回新京”。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由为总司令官捏把汗，因为当时苏军飞机已飞抵“新京”上空，如果在空中相遇，那后果可想而知，但关东军又面临决战时刻，总司令官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只好听天由命了。起飞时山田的座机在中间，两边有零式战斗机护航，幸好飞行途中没有发生意外，只是到“新京”机场时，正在空袭警报解除之后，机场地面一片混乱之时，他从飞机里走出来，努力做出平静、从容、镇定的表情，马上赶到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先听取秦总参谋长的战况汇报，然后研究新的作战部署。这时大本营陆军部也发来了“对苏全面作战”的决定，提出“根据帝国全面战况，以朝鲜为最后一战，必须绝对予以保卫，而以‘满洲国’全土为前方阵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决定性的命令表明，大本营又改变了5月30日制定的《满洲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从原来《要领》中提出的保卫满洲东边道的计划又后退一大步，提出要保卫“皇土”朝鲜，换句话说，这就是让关东军放弃“满洲国”，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战略大变化，使山田乙三感到泄气，下面则更加惶惶不安。

山田无奈只好收缩战线，做最后的拼力一搏。他要求各地驻军逐步后撤，集中兵力，待敌来攻，特别交待第三方面军后宫淳大将把兵力集中到沈阳方向，在沈阳的西北、西南占领防御阵地。山田说：“这可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在这里一定要设法顶住敌人！”后来的战况发展，更是让山田感到焦躁不安，眼见苏联红军分三路突破国境线，对关东军采取合围聚歼的态势，每天推进几乎达80—100公里，关东军再分兵防守就有被苏军一块吃掉的危险，于是山田乙三决定再行收缩计划，将前沿部队后撤，撤至“新京”、沈阳一线，以确保中心城市不丢，同时又可用兵于主要方向，待苏军战线拉长，再扑捉其侧翼弱点

进行攻击，他向秦总参谋长特别强调说：“发布我的命令时，应该告诉全体将士，满洲战局成败在此一举，要发扬特攻精神，特攻不死，神州不灭……”

这时的山田乙三已摆脱了开始时在战略指挥不能自主的烦扰，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逐步显露其日本陆军固有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支持他所领导的关东军进行垂死挣扎。

在黑龙江省虎林县的虎头筑垒，关东军浴血与苏军厮杀，发生了极其激烈的战斗场面。该筑垒由东猛虎山、中猛虎山和虎北山三面环围的高地组成，经十几年的修建，这里成了重要而又坚固的军事要塞，关东军自称这里是“永远炸不烂的陆上航空母舰”，驻守3 000余人。从8月14日凌晨开始，苏军以飞机、大炮、坦克等强大火力的掩护，发动对虎头筑垒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虎头山得而复失，先后九次易手，但苏军一直没有攻克，15名“肉弹”身上横竖捆满了炸药，狂吼着“为天皇献身，死而无憾”直扑苏军坦克而去。在这虎头筑垒的“陆上航空母舰”前，苏军留下了2 000余具尸体。又经一天的拼杀，在苏军大炮的威力下，苏军终于攻下了虎北山，这时，山里筑垒的核心枢纽还有200余名关东军官兵，最后他们眼见大势已去，引爆了存放在山洞里的几百吨炸药，在虎北山腹部全部自焚了。

同样，14日23时在牡丹江市外围，关东军第五军和苏军在桦林、柴河展开激战。牡丹江作为通向“新京”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北大门，一直是关东军重点防御地区，日苏双方为打开和守住这一北大门，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彼此相峙不下50万。两军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柴河车站及站东的铁路桥，关东军在柴河修建的碉堡，沿江有10余个，构成环形防卫，碉堡外还挖有6公里长的防坦克壕，而通向车站大桥的所有通道都埋设有地雷。苏

军在攻占大桥时，步兵师长切列帕诺夫少将负了重伤，而关东军五军军长清水规矩中将坚决执行山田总司令官的命令：“拼死顶住，一步不退”，一直指挥部下负隅顽抗，最后终于抵不住苏军浩大的坦克群攻击，柴河车站失守，牡丹江西岸的筑垒也没保住，桦山镇也被苏军突破防线，构成了对牡丹江三面包围的严峻态势，清水军长至此不得不宣布：“军司令部撤至横道河子，整顿部队再行反攻！立即将柴河车站大桥炸掉，其它守备部队要战斗到最后兵一卒”。结果，许多关东军战士被碾死在苏军坦克履带下，他们凄惨地喊着：“妈妈！妈妈！”

山田乙三除了命令守军坚决抵抗外，还命令各部队在万不得已撤退时，一定要将驻地的公路、桥梁、各种建筑物（包括官衙、民舍、学校、会堂）、电话、车站、隧道等，凡属苏军能利用的公共设施，均要全部予以破坏；至于军用被服、粮秣等要尽力运往通化的主阵地，运不完的，也要就地焚烧……于是在战火复燃的同时，在山田乙三的导演下，烧毁房屋、捕杀百姓之风也大肆在中国东北蔓延开来。

不管山田如何抖发“军国主义”的最后威风，关东军的覆灭却成定局，山田率领的关东军已被神速攻击的苏军分割成一块块、一群群，有的简直成了乌合之众，丢弃了火炮和各种辎重，四散逃亡，以求一生。

8月14日，正当苏军攻势凌厉，而山田乙三及其幕僚们一筹莫展之时，通过“满洲国通讯社”得知，似乎国内有要结束战争的意向，接着留守在“新京”的第二课野原参谋打来紧急电话：“东京明天将有重大新闻广播，总司令官务必返回收听。”于是山田总司令官和秦总参谋长，以及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作战课长草地卓吾大佐、濑岛中佐等人于傍晚从通化返回“新京”总司令部。

8月15日中午，山田、秦等关东军首脑及主要参谋围坐在收音机前聆听天皇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之后，都掩饰不住自己大感失望的心情而恸哭起来。他们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决不相信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这些以“光荣无敌的关东军”自许的参谋幕僚们，是决不愿意放下手中挥舞多年的战刀的。有的年轻参谋甚至杀气腾腾地敲着军刀说，我们不是为了停战而进陆军大学和士官学校的，在我们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投降”这样的字眼！天皇虽然颁布了停战诏书，但是大本营却一直没有下达停战命令。这时苏军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又给山田乙三打来电报，电文口气十分强硬，要求关东军必须学会使用“投降”这个字眼，并且明确指令山田及其所属部队务必在8月20日12时以前放下武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等待苏军受降。这种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坚定要求，更激怒了一些主战的死硬派，他们中有些人以8月14日夜裡收到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电报为依据，继续鼓噪把战争打下去，幻想在最后显示一下不灭的“帝国皇军战魂”。阿南的电报要求关东军在大本营没有新的军事命令前，仍然要继续执行以前的战斗命令。

是战还是和，这一棘手问题摆在了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面前，他又一次感到无所适从了。为了搞清国内情况，只好直接与大本营联系，于是马上派出正在病中的副参谋长兼第一课长松村知胜去东京请示。松村于午后8时到东京，马上恢复了关东军与大本营的电话联系，松村在电话中说，大本营目前正为诸多事项困扰，一时难以理出头绪，所以有关停战的正式统帅令，仍不能立即下达。松村的这一回答很让山田乙三感到为难，当时苏军进攻的危急态势迫在眉睫，部下要继续战争的呼声很高，他必须当机立断，在“战”与“和”的关键问题上做

出明确的抉择。

8月16日夜半，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三楼中央作战室召开了最后一次关东军的参谋幕僚会议，这是事先由山田总司令官和秦总参谋长商议好了的，想通过这个会，统一认识，做出停战的决断。但是他们没有透露什么风声，开会时毫无表情地端坐在会议桌一端，会议由作战参谋草地卓吾主持，草地望着插有部队标志的全满洲大地图，也是板着面孔，简单地说了开场白：“今天召开的是一次重大的会议，可以说关系到关东军今后的命运。本应由作战课长松村少将来主持，但他到东京去了，所以由我代为主持。目前形势的一般情况，各位都已经知道了。首先，请大家把自己的意见都讲出来，以便确定全军今后的方针。”马上就有人发言，因主张不同，发言者都很激动，先后提出三个方案：一是主张坚决战斗到底；二是继续作战，伺机在有利的条件下停战；三是立即停战。与会者有18位，赞成第一方案者竟为多数人，支持第三方案者人员寥寥，连折衷的第二方案也遭到主战派的攻击。他们几乎丧失理智，拼命吼叫，有人站起来说：“投降？只有敌人懂得它，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个词，也不会解释，我只知道两个字：战斗！”接着又有人杀气腾腾地喊：“在日本国的词典里，根本没有这个词，谁言投降，我就先杀掉谁。”另外有几个人随声附和说：“我们惟愿效忠天皇，战死疆场，也不言‘投降’二字！”这时屋内气氛越来越紧张，大有一言不合即拔刀相见的架势，有人竟把手枪从枪套里拿出来握在手中，还有人紧握军刀的刀柄……伴随这种既像威胁又像煽动的话语，走廊里和另一个房间里又传出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手枪的射击声，使本来就已歇斯底里的会议气氛更加激愤，通讯参谋不时送来各种警告电报，各方面军以及各军发来不少措词激烈的电报，有的电报说：“全军要以玉碎来充当皇国的柱石，希

望总司令部对此精诚合作！”山田看了电报默不作声，作为主持人草地卓吾也不好发表意见，看看与会者要说的话似乎也都说完了，他转回头看看秦总参谋长，秦彦三郎知道该是他说话的时候了，他只好站起来哽咽着说：“我国的军队世代代都是天皇统帅的军队，只有依靠皇威才能统帅军队，所以做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外，再没有别的忠节之道。不服从的，将永远被人们看做乱臣贼子。至死要坚持抵抗的人，不要再说什么了，应该先把我们的头砍掉，然后再走！”秦总参谋长搬出了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点出了军人必须服从天皇的天职，好似兜头泼了一盆凉水，使开了锅的会场，马上安静下来，没有人再吵嚷，只能听到绝望的呜咽声……而坐在秦总参谋长旁边的山田总司令官，这时才睁开紧闭的双眼，站起来在屋内背着双手踱来踱去，尽量用淡然平静的语调说：“有个传说，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大概在三千多年前吧，我们大日本在神武天皇的统驭下，鲜花四季盛开，太阳永远照耀，国民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可是天皇手下有个大臣叫素盞鸣尊的，不服从管束，犯上做乱，天照大神一怒之下，隐身于富士山里的岩洞中，于是天地间顿时失去了太阳，变得漆黑一片。”说到这里，山田停顿了一下，又悲愤地说：“现在，我们也面临到这样的局面了，难道我们也要失去太阳，逼迫天皇隐身吗？我也知道，在战争中途自行放下武器，这是天皇军队的最大耻辱，面对殉国的几百万英灵，而我却在苟延余生，真是寝食难安啊！”这时，山田紧咬嘴角，强忍泪水，时断时续地说：“诸君是国家之宝，轻死是对敌人有利的行为。圣裁之下，必须承诺必谨。即使内心充满血泪，含冤饮恨，也应一心顺从和遵奉天皇陛下的命令，切不可感情用事。我们现在只能为结束战争而竭尽全力。进也好，退也好，只有一条奉公之道：照总参谋长的意见办，服从圣断！”

总司令官这番话，使那些好战叫嚣者一时哑了口，一些人头垂得很低，有的人脖子涨得紫红。山田最后又用和缓的语调说：“大家再考虑考虑，我明天将派参谋长去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协商停战事宜，当然，在双方未达成停战条款前，我们也不能束手就擒”。

停战会议刚刚结束，17日拂晓，大本营发来了命令，要点有二：①关东军总司令官应当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但在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之前，遇到敌人进攻，不得已时采取的自卫战斗行动，不在此例；②战斗行动一旦停止，应立即报告停战的时间。”于是山田立即责成草地大佐代表总司令部向下属部队发出停战的军事命令。

裕仁天皇担心素以帝国战魂相标榜的关东军不肯放下武器，于是特派内弟竹田亲王乘飞机于19日下午抵达长春，山田司令官亲去迎接。到达关东军总司令官官邸后，山田报告了情况，竹田转达了天皇要求他们屈辱求生，以待来日的希望，并立即同正在哈尔滨与苏军谈判的秦总参长通了电话，告诉他圣上的旨意，应无条件停战。

20日，山田乙三又下令，联队以上建制的，在向苏军交出武器之前，应将军旗毁掉。中午1时正，在长春关东军的练兵场上，有42面军旗被堆集在一起，在“君之代”的国歌声中，军旗被倒上汽油，引火焚烧，山田乙三大将率领148名将官，泣咽着向火燃烧的军旗致军礼。关东军一向视军旗为军威兵魂的象征，山田不忍军旗在受降时遭辱，故决定由关东军自己引火烧毁。此举可视为武士道精神在山田乙三身上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引发了其它军官的“效忠”情绪，面对焚旗的火焰，于是枪声四起，呼喊不断，有20余名将官拔枪自杀，倒在军旗的灰烬之中。

8月22日，在长春关东军东城演习场，按照苏联远东军总

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命令，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率领97名将领，1500余名校佐，在这里举行投降仪式。上午9时左右，苏军以华西列夫斯基为首的高级将领分乘8辆吉普车驶进受降会场，山田乙三等关东军将领，则低首垂手站立，当会场奏起苏联国歌进行升旗仪式时，山田、秦等将领则立即肃然脱帽，然后，山田走到华西列夫斯基面前，将关东军的编制、武器、人员名单和序列表俯首恭递上去。至此，在中国东北的战事宣告结束，关东军正式缴械，向苏联红军投降。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缴纳武器有火炮、迫击炮、掷弹筒37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11000挺、汽车2000辆、战马13000匹，军备给养仓库679个。山田统帅下的关东军战死84000余人，投降的官兵有59.3万余人。山田乙三作为失败的将军而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并成了苏军的阶下囚而拘押于伯力。

如果说，作为黠武主义者的代表，关东军总司令官最后束手投降，使山田感到屈辱的话，那么抛弃几百万日本侨民，让他们陷于饥寒交迫的困顿境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则是山田乙三欠下的一笔永世难以偿还的血泪债。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8月10日14时40分，山田就命令关东军所属系统在长春的军人家属快速在17时以前于忠灵塔前集合，夜半11时40分第一列遣送车从长春站开出，尔后每隔2小时开出一列车，这一列列遣送车分别经吉梅线、安奉线转往朝鲜新义州、平壤等地。紧接着“满洲国”政府日系官吏和国策会社有关首脑的家属也都被遣送回朝鲜，然后他们再由朝鲜转道回日本。当普通日本居民得知上述消息后，他们几乎都要疯了，马上拖儿带女地赶往火车站拦截每一辆军属的避难车，在车站上经常发生殴斗，形势十分紧张，关东军第四课代理课长

原善四郎只好出面向伪政府当局武部六藏解释说：“因为情况紧急，在疏散上，关东军家属最容易组织、准备工作也进行得快，因此首先让军人家属走了”。真是不打自招，他们承认了一个事实，即以承担保护居留民为己任的关东军，竟在日苏开战后，立即抛开一般日本居民不管，自己带头撤往通化不说，把家属也有计划地先撤走了。山田乙三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日本人民所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那些居住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的日本居民还算不幸中之幸运者，最不幸最悲惨的是远在边境的日本开拓民。

日本开拓民约有132万左右，绝大多数住在中苏边境上，故在8月9日以后，他们立即陷入灭顶之灾，被裹挟在日苏的对立冲突之中，战败了的关东军自顾自己狼狈逃命，遇见开拓民要求保护，根本不予理睬，这一百余万人陆陆续续向大城市集中，一路上冻饿等原故而死的差不多有一半。

据说开战不久在研究军事部署时，山田曾公开表示让日本居民后撤回国，第一步可先撤至通化地区，但不能影响军事行动，他还下令让拨10列火车运送，但在实际执行时面临大溃败、大逃亡形势已无法落实了，特别是秦总参谋长还有一个主张：让日本居民和军队一起作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杀身成仁，无论如何不能降于敌人。这一做法后来居然也得到山田乙三的赞同，他十分悲哀地说：“战争打到这一步田地，居然让我们日本人的父母妻儿共同殉国，实在是帝国军人的悲哀，但非此不能维护大局，我想，他们的在天之灵是不会怨恨的。”自此关东军大开“集体自裁”的杀戒，在牡丹江竟然有四卡车手无寸铁的妇老幼弱，遭关东军机枪连射，美其名曰：“为天皇尽忠！”

嗜杀成性的关东军，在临近灭亡前，竟将自己民族的双老至亲和膝下骨肉，一同作为殉葬品，带进坟墓，演出了“民族

自决”的惨剧。对此，作为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不管出于什么情况总是难辞其咎的。

关东军司令官对伪皇帝的“督导”^①

王庆祥

……历届关东军司令官……在东京大本营的导演下，承担伪满这台戏的直接演出责任。

……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官邸——那是一座“帝宫”，无法比拟的西式大楼，却也在帝宫之内设有自己的站脚处，那就是位于勤民楼二楼的“贵宾室”，每次关东军司令官入宫就在这儿稍坐，然后便与溥仪晤谈。

关东军司令官当然是可以随时到这里来的，但他们在一一般情况下，每月依例只来三次，这大概是要保持自己尊贵的身份吧。武藤信义任司令官时期，在每月逢一的日子里举行定期会晤，即1日、11日和21日，武藤都要出现在勤民楼二楼那间“贵宾室”中。到菱刈隆任司令官时期又改为逢二的日子会晤了。

按照东京大本营的决定，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日本驻满全权大使。因此，每次新司令官上任，都要进宫向伪满皇帝“递交国书”。溥仪则照例接受国书后致答辞。南次郎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全权大使的时候，就是在勤民楼二楼东侧正殿举行的递交国书仪式。溥仪的答辞如下：

此次贵国大使，奉贵国天皇陛下之命，继菱刈前大使出任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